

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的学术特色与价值评估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Evaluation of Chinese Museolog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李 飞

Li Fei

(深圳博物馆, 深圳, 518026)

(Shenzhen Museum, Shenzhen, 518026)

内容提要: 从学术史角度而言, 民国时期是中国博物馆学形成与初步发展期, 此一时期, 中国博物馆学在学科建制上完成了“学科化”, 并体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和学术特色, 对此学界鲜有专门论述。本文拟从“学科”概念入手, 梳理相关史实, 以明了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的总体面貌, 并对其进行初步价值评估, 以为今日中国博物馆学的发展锚定起点, 提供相应的理论思考基础。

关键词: 博物馆学 博物馆学史 民国时期 学科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history,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was the period of formation and initi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eology. During this period, Chinese Museology completed the “disciplinarization” of their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reflected correspo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academia, which has been rarely discussed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start with the concept of “discipline”, sort out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and understand the overall appearance of Chinese Museolog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and conduct a preliminary value evaluation of it, in order to anchor the starting poi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eology today and provide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thinking basis.

Key Words: Museology; history of museology;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discipline

中国现代学术体系肇端于晚清民国, 而“创造实绩的拓展和繁荣, 是在二十年代后半期和三四十年代”^[1], 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1928年设立中央研究院, 均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里程碑。以“分科治学”为

特点的现代学术体系由此在中国扎根, 开始从传统“四部之学”(经史子集)到“七科之学”(文、理、法、医、工、农、商)的知识转型: 史学、文学、哲学、考古学、社会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新式学科相继诞生, 这个转型“从19世纪60

年代开始, 20世纪初基本实现, 而直到20年代末才最后完成”^[2]。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 源自域外的“博物馆学”无疑也经历了从早期的零星知识输入, 到学科自觉再到形成独立学科的过程。从历史上看, 所谓某某“学科”是特定历史时空的产物, 今日熟知的各“学科”, 基本都是19世纪西方社会通过在大学设立专门学系、建立专门研究机构或在图书馆以“学科”名义对书籍进行分类等途径陆续确立, 西方的“博物馆学(museology或museum studies)”也由此而发, 虽因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传统未能取得对此学科的一致认同, 但以“博物馆”为主体的研究取向却是共识。20世纪30年代, 内涵并不明确清晰的“博物馆学”被引入中国, 中间还经过日本的中转, “博物馆学”这门西洋学问在中国落地生根, 开始了从“‘博物馆学’在中国”向“中国博物馆学”的演化。随着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日渐完善, 民国时期“博物馆学”也成为中国学术之林中的一个门类, 虽然薄弱且影响有限, 但也深刻反映出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全面广泛。

关于“博物馆学”在中国的形成时间, 目前仍有争议, 主要为1905年说、20世纪30年代说和20世纪50年代说^[3], 然而争议实质, 并不在何谓“博物馆”, 而是对“学(科)”的定义不同。如果从现代“学科”概念出发, 明确“学科”的主要特征, 达成对此概念的共识, 相信在厘清史实基础上, 对中国博物馆学这一现代“学科”的形成时间也不会有太大分歧: 即中国博物馆学从萌芽到形成独立学科建制, 当在20世纪30年代。

如果承认中国博物馆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 那么博物馆学和其他学科如历史学、文学、考古学等相较, 其发展已落后近十年。然而在1912年至1949年, 中国博物馆学完成了从零散的知识输入到学科自觉, 从个别学人的只言片语到专业学会、专业杂志相继创设、专业学者群体形成的过程; 以“博物馆学”为名的专著涌现, “博物馆学”在高校正式设立。对此30余年的博物馆学发展的成绩, 学界鲜有系统评估, 在此抛砖引玉, 希望引起进一步思考。

一、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的形成

徐玲梳理了关于中国博物馆学产生时间的不同观点, 认为“博物馆学作为知识名称在20世纪30年代的开始使用, 可视之为中国博物馆学学科的产生标志”^[3]。

关于1905年说, 一般追溯至张謇, 张謇1905年在《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室博览馆议》中提出“六端”之说, 即从建筑之制、陈列之序、管理法、模型之事、采辑之列、表彰之宜六个方面为拟设博览馆提出建议。因此, 有学者指出张謇是“我国第一位比较系统研究博物馆学的人”, 也是“我国第一位提出重视和培养博物馆学的人”^[4], “张謇的有关博物馆学理论不仅是中国博物馆学的开端, 而且还属于当时世界博物馆学理论体系范畴之内”^[5]。然而从世界范围看, 西方的博物馆学, 即Museography(19世纪出现Museology这一名词), 虽早在18世纪就已出现, 19世纪也使用较多, 但涵义比较模糊, 大多和博物馆的收藏、实践等活动有关, 其内涵并不清晰固定。1905年前后作为中国现代知识体系来源地的欧美、日本, 也均未出现具有学科意义的“博物馆学”概念, 故中国博物馆学的诞生, 恐怕还需置于更长的时间段中观察。

众所周知, 十九及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期, 博物馆这一社会机构在世界各地扩散发展, 博物馆界内部也产生更多的知识共享需求, 故而不同层级的博物馆协会相应而生。1926年, 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推动下, 国际博物馆事务局(the 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Musées, 简称为OIM)成立, 这是首次建立的博物馆国际组织。1934年, OIM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Museography Congress), 深入讨论了博物馆学这一概念, 最后出版两卷本的《博物馆学: 艺术博物馆的建筑与组织》(Muséographie—Architecture et Aménagement des Musées d'art)一书^[6], 该会就博物馆学(Museography)的内涵和价值达成若干共识, 提出“博物馆为博物馆学的中心主体”^[7], 此次

会议成为博物馆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代表中国参会，“返国后，即联络各学术团体，筹备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8]，1935年5月18日，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

由此看来，中国博物馆协会的成立，和国际博物馆学发展密切相关，几乎同步。就博物馆学而言，如果承认它为一个学科，就必须明白所谓“学科”，是一个较晚才形成的专业术语，也是特定历史时空的产物。“学科”对应的英文“Discipline”，常用于描述基于经验方法和诉诸客观性的新学科，所以通常称一个研究范围为一门“学科”，即是说它并非只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和真理^{[9]13}。目前熟知的各现代学科，基本都是在19世纪出现，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各种科学学会的形成，学会成立标志了知识划分史上的变革^{[9]16}。学会可聚集专心某一领域的学者群体，创办专业期刊，交流研究心得，推动出版学术著作，在高校设立相应专业，培训人才，形成持久的学科影响力，这是现代学科的共同发展历程，故评判某学科是否形成的标志之一，即是相应学会的成立与活动。中国博物馆协会作为中国博物馆学的学会，其重要意义即在于此，说明中国博物馆学的形成时间当在20世纪30年代。

博物馆学和图书馆学都是晚清民国时期传入中国的新学科。关于图书馆学的学科史，已得到较好梳理，如图书馆学形成的标志，有学者归纳为以下七点：“图书馆学概念的提出。图书馆学教育的兴办。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中国图书馆协会的创办。图书馆学专业期刊的兴办。图书馆学学术群体的形成。图书馆学理论成果的大量涌现。”按照这些标志，可判断中国图书馆学20世纪20年代初步形成^[10]，参考这些标志，亦不难得出中国博物馆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结论。

关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博物馆学，前辈学者也有概括，如梁吉生提出“（20世纪）三十年代是中国博物馆学比较发展的阶段”^[11]，苏东海认为“三十年代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富有希望的年代，是博物馆学在中国兴起的年代”^{[12]27-28}，《中国博物馆学基

础（修订本）》指出“中国博物馆学是20世纪30年代起步的”^[13]，《中国博物馆学史》课题组认为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创办协会会报和举办年会，“这些均标志着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已开宗立派，形成了一股合力，开创了中国博物馆学有组织有系统学术研究活动的先声”^[14]。

由此则可概括，晚清民国以来，关于博物馆的知识通过期刊、报纸、游记、专著等不同媒介输入中国，但较为零散，不成系统。20世纪30年代中国博物馆事业迎来第一个发展高峰。在实践中，中国博物馆事业孕育出较为专业的从业者，他们也需要逐步形成理论体系，在国际博物馆学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下，中国的“博物馆学”应运而生，并最终完成建制化。

二、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的面貌

梁启超曾言“盖吾辈不治一学则已，既治一学，则第一步须先将此学之真相，了解明确，第二步乃批评其是非得失”^[15]，事实上已指明学问进步的途径。故本文先从博物馆学知识传播、博物馆学专业组织的建立、博物馆学专著和专业期刊的出现、博物馆学学者群体的形成、博物馆学学科在大学的设立、“中国博物馆学”概念的提出等几方面，概括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的面貌。

1. 博物馆学知识传播

博物馆的知识输入中国，鸦片战争前早已开始；而“博物馆学”这一概念则是在民国时期才介绍到国内。民国时期，如《教育杂志》《教育周刊》《东方杂志》《旅行杂志》《良友画报》《少年画报》《科学画报》《中外经济周刊》《中央时事周报》《时事月报》《图书馆季刊》《学术世界》《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云南教育》《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浙江图书馆馆刊》《考古社刊》《工业安全》等，都曾刊发有关博物馆的文章，包括对域外博物馆的介绍，或对国内博物馆如西湖博物馆、国立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报道，及对民俗博物

馆、安全博物馆、工业博物馆、儿童博物馆等博物馆新类型的引介，还讨论过博物馆与文化建设、博物馆与边疆建设、博物馆与民族复兴、博物馆与社会教育、博物馆与地方开发等关系。如把博物馆知识纳入博物馆学的范畴，那么民国时期关于博物馆学的知识传播无疑更加广泛多样。如马宗荣1933年刊发《现今博物馆的设施与教育》一文，系统论述了博物馆的历史、建筑、灯光、展览、藏品、教育、组织等，提出“博物馆学的内容极为丰富”，指出德国慕尼黑大学开有博物馆学讲座，日本教育部开有博物馆学讲习会^[16]，是较早出现“博物馆学”名词的文献。1936年杨成志刊发《现代博物院学》，指出20世纪博物院成为一种科学，在英、法、德语中分别被称为Museology、Museologie、Museumkunde，“博物院学确系现代一种科学”^[17]，这里的“博物院学”就是“博物馆学”，反映出学科形成初期名词尚不统一的情形。

2. 博物馆学专业组织的建立

1935年成立的中国博物馆协会，既是行业协会，也是专业学会，协会以“研究博物馆学术，发扬博物馆事业，并谋博物馆之互助”为宗旨，在成立大会上，临时协会主席马衡提出了协会三项重要任务：“本互助之精神，以既得之经验，谋未来之发展。唤起一般人之注意，使对于民族固有之文化，有真确之认识，而增加其研究之兴趣。与世界各国博物馆，互通消息，以资借镜。”为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轮流于各博物馆所在地，举行年会，讨论一切改进工作，并参观各博物馆，以收切磋观摩之效。发行刊物，并举行学术演讲，使高深之学理，与应用之技术，日益精进”^[18]，可见协会的学术性很强。1936年7月，中国博物馆协会与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青岛召开联合会，出席年会代表及记者共有300人，《青岛时报》特辟专版予以报道，这也给“博物馆学”造成一定社会影响。中国博物馆协会作为专业学术团体，它的建立是“一个行业一个学科从‘单打独斗’到‘集体奋斗’的巨大进步”^[19]，也成为中国博物馆学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

3. 博物馆学专著和专业期刊的出现

民国时期，尤其20世纪30年代，涌现出一批关于博物馆学的专著，如费畊雨、费鸿年编著《博物馆学概论》（1936）、陈端志编著《博物馆学通论》（1936）与《博物馆》（1937）、荆三林编著《博物馆学大纲》（1941）、曾昭燏、李济编著《博物馆》（1943）。

这一时期，上海市博物馆还出版《上海市博物馆丛书》，丛书共分甲、乙、丙、丁四辑，分别对应博物馆学、历史、艺术和考古四类。在甲类（博物馆学）专辑下，先后出版陈端志《博物馆学通论》《地方博物馆实施法》和胡肇椿、曹春霆《古物之修复与保存》等书，为博物馆学知识宣传普及做出贡献。

期刊方面，则出现《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河南博物馆馆刊》《四川博物馆馆刊》《西湖博物馆馆刊》《东莞博物馆馆刊》等，集中刊发众多与博物馆建筑、陈列、功能、教育相关的文章，也是中国博物馆学具体展开的直接证明。

4. 博物馆学学者群体的形成

现代学科形成离不开专业学会和学者群体。民国以来，依托于博物馆、大学、政府机关和各类文化机构的学者，以博物馆事业作为研究取向，翻译引进海外最新学说，系统介绍海外博物馆史，以及博物馆建筑、陈列、收藏、教育等知识，将其输入国内，再结合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建立中国博物馆历史发展的谱系，从而奠定今天论述中国博物馆史的叙事典范。和其他领域相比，民国时期专门从事博物馆学研究的学者数量较少，很多都是以考古学、历史学、图书馆学、地质学等为本位学科，兼及博物馆学方面研究。其中较为活跃者如陈端志（1935年任上海市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员、1936年任该馆总务部主任，为博物馆服务生培训开设博物馆学课程，1937年任该馆历史部主任）、胡肇椿（燕京大学毕业，后赴日学习考古学，先任中山大

学历史系副教授，兼任广州黄花考古学院研究员，1936年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组织编辑出版《上海博物馆丛书》，1946至1949年任广州市立博物馆馆长）、郑师许（任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1936年兼任上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和艺术部主任）、荆三林（1930年入河南博物馆研究部做练习生，学习考古学、博物馆学、人类学、科学技术史等，后任《河南博物馆馆刊》编辑，1935年加入中国博物馆协会）、曾昭燏（1938年被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1941年2月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代理总干事，后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杨钟健（1929年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主任，1935年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当选为执行委员。地质调查所陈列馆南迁后，筹建北平分所陈列馆）等，很多都是博物馆从业者，或具备大学教师与博物馆事业管理者双重身份。与此相比，显然今天在高校中专门从事博物馆学研究的力量大为加强，博物馆从业者的博物馆学研究权重则相对降低。

5. 博物馆学学科在大学的设立

中国近代学制变革发生在清末，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清末新式学堂中运用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分科”教学。某学科能在大学教育体系中确立，则说明此一学科得到了学界普遍认可。“博物馆学”就是在民国时期正式进入大学教育序列。如前所论，关于“博物馆学”概念目前所见似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实践中，“博物馆学”的讲授可追溯至1936年上海市博物馆的培训。1936年1月，上海市博物馆公开招考服务生，报名应考者有七十余人，最后只录取了六名，自1月18日开始，胡肇椿、陈端志、郑师许、叶恭绰、黄宾虹、商承祚、杜定友等为录取学生授课，其中胡肇椿主讲《博物馆学》^[20]。1941年抗战时期，在四川璧山创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院设有图书博物馆学系，“揭开中国博物馆教育史的第一页”^[21]，这也是中国博

物馆学形成壮大的标志。图书馆博物馆学系内设博物馆学通论、博物馆史、博物馆学专著研究、博物馆经营法、博物馆行政、博物馆问题讨论、特种博物馆、博物馆教育等课程^[22]，授课老师有荆三林、卫聚贤、祝嘉等。1947年韩寿萱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筹建“博物馆专修科”，开设博物馆学、博物馆技术、博物馆美术设计等，后发展为独立的博物馆学科。1948年3月，国立中山大学拟设人类学系，主事者杨成志拟延揽胡肇椿在系内教授《博物馆学课程》^①。综上可知，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专业学会建立和学者群体的形成壮大，在高等教育的学科之林中，“博物馆学”终获一席之地。

6. 中国博物馆学的概念提出

“博物馆学”作为一门西洋学问，和别的现代学科类似，其在中国的生根发展必须要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且须运用这门学问的学理，利用中国的学术材料，解决中国问题，依托中国经验，提出新的理论观点，不断丰富此门学问的内涵。

民国时期即有学者提出从“博物馆学”到“中国博物馆学”的转化，如袁同礼在《抗战期中我国博物馆之动态与前途》中呼吁“中国博物馆学之发扬”，他提出中国固有保存文物方法和艺术品装潢技术，“多有远胜于欧美各国者”，这些方法和技术，如书画的装潢、金石的锥拓、艺术品配件的设计等，既是博物馆学绕不开的内容，又是中国传统技艺，富有中国特色，但随着中国工业化程度加深，这些传统技艺陷入尴尬境地，传承乏人，袁同礼指出“一方面固应吸收欧美最新之方法，但同时对于我国固有之方法及技术（此处指保存文物方法及艺术品装潢技术），尤应予以保存，努力创造一种中国博物馆学”，不但要将中国博物馆学“普及于本国，并应设法使其普遍于全球”^[23]。民国时期学者提出的“中国博物馆学”概念和取向，及指示的路径，对今日反思中国博物馆学不无裨益。中

① 当时胡肇椿已在中山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开设了博物馆学课程。可参《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见刘昭瑞编：《杨成志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3页。

国博物馆学不应仅是西方“博物馆学”在中国的投影，而应有中国特色、中国智慧贡献于其中。

三、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特点

在对民国时期博物馆学整体面貌梳理基础上，则可可知这一时期博物馆学研究有如下特点。

首先，民国时期博物馆学整体而言，具有较强的国际视野，如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即是受到国际博物馆会议影响。

从事博物馆学的学人多有留学背景，如袁同礼留学美国、胡肇椿留学日本、曾昭燏留学英国，中国博物馆协会挂靠的故宫博物院，依托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其中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和欧美、日本学术界保持密切关系，其发行的《国学季刊》表明研究的“国学”，也以西方“汉学（Sinology）”为取法对象，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作为留美预科学校和教会学校，国际化色彩更为浓厚，这也是民国时期的总体特征，“近代以来，尤其是中华民国建立以来，中国已经融入全球现代化发展的体系之中。中华民国处于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深的时代”^[24]。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经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等重大历史变革后，“对传统文化既有深厚的继承，对西方近现代科学文化又有敏锐广泛的吸收”，遗憾的是这一进程被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打断，钱穆回顾“果使战祸不起，积之岁月，中国学术界终必有一新风貌出现”^[25]。在充分吸收西方学养同时，当时文化界也有“再造中国文化”的倾向，此时提出“中国博物馆学”概念，正反映当时学者的某些学术追求，即用发展的眼光和相对的态度将西方博物馆学理论引入，但并非将其视为不能更改一字的经典，而是要运用中国文化资源，解决中国问题，如袁同礼指出将装裱艺术、拓片技艺等纳入“博物馆学”的范畴，发展出“中国博物馆学”以贡献世界。立足本土、国际视野是民国博物馆学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之一。

其次，民国时期从事博物馆学的学人，博物馆从业者居多，高校或研究机构的学人较少，造成民国博物馆学在问题意识、关怀对象和实操性方面具有较强

的实践性；但在学理方面，大多只能借鉴西方既有学说，整体思辨性较弱，从而影响了理论研究深度。

当然，在中国博物馆学的初创期，对此点亦不能苛求，毕竟今日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在理论创新方面，也是难度较大。对民国时期的博物馆学人，应加强研究力度，以呈现更为丰富的历史面相，如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研究生毕业的胡肇椿，20世纪30年代初回国服务，他的学术经历和工作经历，与中国近代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几乎同步。胡肇椿的学术重心虽然集中在考古和文物研究，但他始终密切关注中国博物馆及博物馆学的发展，是一位不能轻易忽略的人物。

最后，民国时期的博物馆学，具有较强的现实关怀。

对此苏东海先生已有总结，他指出“中国从西方移植博物馆，一开始就突出了博物馆的社会使命，办博物馆和开发民智，救亡图存联系起来”，“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一开始就体现了时代的呼唤，着眼于历史的使命和社会的责任。在博物馆宗旨、博物馆功能的研究中，突出社会使命意识，是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在第一个发展时期值得重视的特征”^{[12]28}。胡焕庸《开发边疆与设立边疆博物馆之关系》^[26]、荆三林《民俗博物馆在现代中国之重要性》^[27]、王幼侨《博物馆与民族复兴》^[28]等均体现出这个特点。

四、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的价值评估

综上，在对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学总体把握上，可知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的学问起点较高，国际化色彩浓厚，这也是民国学术的一大特征，为后世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需要警惕的是，晚清以后，因中国在中西竞争中处于下风，导致某些国人殖民地心理较为严重，如在治学方面，“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常用西洋理论比附中国情形，运用外国理论学说对中国本土事实进行曲解，从而造成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所谓“食洋不化”，这在民国学术史

中亦不鲜见；但因民国时期博物馆学理论正在成长阶段，此一方面反而少了一些困扰。

这一时期的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者多是博物馆从业者，或具有博物馆工作经验的人兼具学者身份，故其研究成果和结论，取法域外的经验较多，形而上的思辨性则少，理论和现实距离较近，“学”和“术”相距不远。如郑师许认为当时中国教育方式以“读课本”为主，“是打了折扣的教育，不是耳眼口手全到的教育”^[29]，亟需博物馆发挥实物教育作用。荆三林提出要根本上解决中国遭

受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就需普及知识，让所有人民掌握现代知识，才能经济景气、政治上轨道、武力有保障，博物馆是“社会教育”“改良社会”的重要工具^[28]，这些确实切中当时中国社会的时弊，且具有一定可操作性。

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的价值取向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此虽源自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整体心态，但也提示当今博物馆人“不忘初心”，在探寻“博物馆”如何嵌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如何更好推动中国社会全面发展进步方面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 [1] 刘梦溪.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傅斯年卷[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53.
- [2] 左玉河.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5.
- [3] 徐玲. 中国博物馆学学科发展的回顾与反思[J]. 东南文化, 2014(5): 101-109.
- [4] 甄朔南. 中国博物馆学百年发展述略[J]. 中国文化遗产, 2005(4): 113-115.
- [5] 李慧竹. 博物馆学体系初探[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6: 31.
- [6] SOARES B B. A History of Museology: Key authors of museological theory[C]. Paris: ICOFOM, 2019: 24.
- [7] 刘婉珍. 互即互入——博物馆学的存有与发展[J]. 博物馆学季刊, 2013(1): 81-101.
- [8] 国内教育界(二十四年六月): 中国博物馆协会之成立[J]. 中华教育界, 1935(1): 222-223.
- [9] 华勒斯坦, 霍斯金, 鲍尔, 等. 学科·知识·权力[M]. 刘健芝, 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10] 中国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6-7.
- [11] 梁吉生. 近代中国博物馆学研究概述[C]//中国博物馆学会. 博物馆学论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 5.
- [12] 苏东海. 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综述[J]. 中国博物馆, 1993(4): 27-31.
- [13] 王宏钧. 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20.
- [14] 《中国博物馆学史》课题组. 知识·理论·体系·学科——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轨迹检视[J]. 中国博物馆, 2006(2): 90-96.
- [15]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45.
- [16] 马宗荣. 现今博物馆的设施与教育[J]. 教育与民众, 1933(8): 1333-1360.
- [17] 杨成志. 现代博物院学[J]. 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 1936(3): 97-103.
- [18] 成立大会纪事[J]. 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 1935(1): 5-8.
- [19] 吴昌稳. 民国时期的中国博物馆协会与中国博物馆学: 1935—1949[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8: 162.
- [20] 李大超, 胡肇椿. 上海市博物馆筹备经过报告[J]. 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 1937(3): 6-10.
- [21] 荆三林. 揭开中国博物馆教育史的第一页[M]//峥嵘岁月(第1集). 苏州大学社会教育学院武汉校友会, 1987: 384.
- [22] 傅道文. 我们的母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一所具有创新特色的高等学府[M]//峥嵘岁月(第2集). 苏州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四川校友会, 1989: 8.
- [23] 袁同礼. 抗战期中我国博物馆之动态与前途[J]. 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复刊, 1941(1): 2-4.
- [24] 陈谦平. 民国史研究多国史料的运用与国际化视角[J]. 民国档案, 2020(3): 63-72.
- [25] 邓云乡. 文化古城旧事[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7-8.
- [26] 胡焕庸. 开发边疆与设立边疆博物馆之关系[J]. 边疆半月刊, 1937(5): 4-5.
- [27] 荆三林. 民俗博物馆在现代中国之重要性[J]. 学术世界, 1936(2): 58-61.
- [28] 王幼侨. 博物馆与民族复兴[J]. 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 1937(1): 14-16.
- [29] 郑师许. 论吾国急宜提倡博物馆事业[J]. 学术世界, 1935(9): 5-8.